



馬禮遜入華宣教200年

◎馬敏

基督教在華 傳播及其文化 教育事業

之命

世五口來百黃
間湖中時歲金
最四吃糊三白
大海盡塗萬玉
為百去六非
生和時千為
死客味亡日實
白如身空若
玉何上度無
金落在穿人
生間命

基督教在華傳播及其文化、教育事業 / 馬敏著。—初版。—臺北市：宇宙光全人關懷，2006（民95）

面；公分

ISBN 978-957-727-279-9（平裝）

1. 基督教-中國-歷史-論文, 講詞等

248.207

95009130

基督教在華傳播及其文化、教育事業

定價 240 元

作者：馬 敏

總策劃：林治平

召集人：林治平

副召集人：魏外揚

編輯委員：王爾敏、查時傑、章開沅、馬敏、吳梓明、李金強

責任編輯：宇宙光文字部

發行人：林治平

出版發行：財團法人基督教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24號8樓

電話：(02)23632107 傳真：(02)23639764

郵政劃撥：11546546（帳戶：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

網址：<http://www.cosmiccare.org/Book>

承印廠：辰皓國際出版製作有限公司

經銷商：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880號14樓 (02)82275988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0012號

2006年7月初版一刷

2007年3月初版二刷

版權所有，無論全書或部份內容翻印、轉載、或以廣播、錄音帶等方式使用本書內容時，皆須事先告知本社，並於使用時註明出處；如在著作或任何形式發表時，簡短的引用本書內容則只需註明出處。

（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Printed in Taiwan

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 合作出版



馬禮遜入華宣教

200

19

基督教在華傳播 及其文化 教育事業

◎馬

敏

目錄

Contents

自序／曲徑通幽：我與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	7
【一】馬希曼、拉沙與早期的《聖經》中譯	17
一、馬希曼、拉沙其人	
二、馬希曼、拉沙的譯經事業	
三、馬希曼與馬禮遜	
四、對後世譯經的影響	
附錄：馬希曼、拉沙《聖經》中譯本順序表	
【二】語法書：馬希曼是否抄襲了馬禮遜？——	41
十九世紀初早期英國傳教士之間的一場爭論	
一、事發原委	
二、馬希曼的申辯	
三、初步的評判及其他	
【三】論韋卓民的基督教文化觀	67
一、生平及皈依基督的心路歷程	



- 二、基督教與中國文化融通的可能性
- 三、基督教與中國文化融通的具體路徑
- 四、世界大同文化與文化融合

【四】艱難的蛻變—— 95

1949年前後的華中大學與韋卓民

【五】教會大學的國際化特色——華中大學個案分析 119

- 一、各差會與華大的創辦
- 二、華大財產、經費、師資的國際化構成
- 三、國際化與教會大學的文化氛圍

【六】抗戰期間教會大學的西遷—— 159

以華中大學和湘雅醫學院為例

- 一、西遷前夕華中地區的基督教高等教育
- 二、華大和湘雅的被迫西遷
- 三、西遷後的華大和湘雅



四、結論：西遷的意義與影響

【七】基督教在近代湖北的社會事業概述

181

一、湖北教會的文化事業

二、湖北教會的教育事業

三、湖北教會的醫療事業

四、結 論

自序

曲徑通幽：我與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

我之步入教會大學史研究領域並進而涉及基督教在華文化傳播問題，純屬偶然。

大學畢業進入研究生階段的學習後，業師章開沅先生爲我指示的研究領域是中國近代資產階級研究，具體的切入點是蘇州的商會與紳商，以後則擴大爲整個商會與紳商問題研究，籠而統之，可以說是社會經濟史研究，這也是我至今作爲史學從業人員的基本定位。

但即便是作爲研究領域相對固定的歷史研究者，一生的研究工作似乎也不大可能完全固定，因時勢的異移，興趣的改變，或偶爾的機遇，附帶的研究領域也時時可能發生。我和教會大學史的因緣，即是出於偶爾的機遇。先是上世紀八〇年代中期業師章開沅先生因旅美資深學者、宋史專家劉子健教授的建議，對研究中國教會大學的歷史發生濃厚興趣，我主要受章先生的影響，開始涉足於閱讀和整理我校前身之一的華中大學的檔案，華中大學係基督新教在華所開辦的 13 所教會大學之一。大約是在 1986 年左右，普林斯頓大學的林

蔚（Arthur Waldron）博士為魯斯基金會擬資助該校的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計畫，前來中國相關大學進行調研，我有幸作為章先生的助手參與接待林蔚博士，由此，開始了一段與教會大學史領域一批中外學者的學術交往，在國內較早也較深地介入了中國教會大學史的研究，至今仍未完全中斷。

所謂教會大學，是指從十九世紀末葉起西方基督教會在中國所創辦的高等教育機構。其中由基督新教創設的大學有13所，分別為燕京大學、金陵大學、聖約翰大學、滬江大學、華西聯合大學、齊魯大學、華中大學、福建協和大學、之江大學、嶺南大學、金陵女子大學、華南女子文理學院；由羅馬天主教創設的大學有3所，分別為震旦大學、輔仁大學、津沽大學。這些在華教會大學是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前驅和重要組成部分，對傳播西方科學文化知識，促進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國的近代化進程，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由於教會大學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所占的重要地位，自五〇年代起，西方史學界就開始了對這一領域的探索，並取得了若干有相當水準的學術成果，如魯珍晞（Jessie G. Lutz）教授所著《中國教會大學史》（康乃爾大學出版社，1971年英文版；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中文版，曾鉅生譯）即是其中傑出代表作之一。但在中國大陸，因長期受「左」的思想影響，簡單地把教會大學視同為帝國主義的「侵華工具」、「反動思想堡壘」和「文化租界」等等，甚少有人涉足這一學術禁區。直到二十世紀八〇年代初，隨著新時期思想解放運動的興起，人們才掙脫種種思想束縛，重新開始審視中國教會大學的歷史，對之做出新的評價。我至今仍清楚地記得，1988年3

月，早春的成都乍暖還寒，以章開沅、顧學稼、張寄謙為首的21名中國學者同專程從美國趕來的普林斯頓大學的林蔚博士相聚於四川大學校園，召開一個關於合作研究中國教會大學史的工作會議。與會者不顧室內天氣的寒冷，就教會大學史研究的意義、方法及中外學術合作的可能性等進行了熱烈、深入的討論。這次會議的許多話題，成為以後持續十年之久的中國內地教會大學史學術研究熱潮的起點，標誌近代史研究中一個新的學術領域的誕生。我對自己能親身見證中國當代學術上的這一歷史性時刻而深感慶幸。

就我個人對中國教會大學史的研究而言，因受資料和學識的限制，始終局限在比較狹小的範圍，主要是對作為我校前身之一的華中大學史的研究，走的是以個案研究為主，解剖麻雀式的路子。若稍作分類，一是對韋卓民老校長的人物研究；一是關於華中大學辦學歷程與特色的「校史」研究。關於前者，韋卓民先生在他那一代知識分子中，堪稱「跨越中西文化的巨人」，他是一位著名的基督教哲學家、神學家、教育家，同時又秉承了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他曾擔任位於武昌的教會大學——華中大學校長一職逾20年之久，有著豐富的教育行政管理和辦學經驗。這樣一個學貫中西的哲人和教育家，自然值得作為一個典範來研究，從而揭示他那一代知識分子艱難跋涉的心路歷程和中國近現代社會複雜、曲折的轉型過程。

我對韋卓民先生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兩項：一是〈韋卓民的基督教文化觀〉，先是發表於香港的《道風漢語神學學刊》1995年第3期，後稍作擴充後收入我所主編的《韋卓民基督教

文集》（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年出版），作為對韋氏生平和學術的一個簡介。這篇論文的主旨，在於論證韋卓民先生曾圍繞基督教文化與中國文化相融通的中心線索，形成了自己獨具一格的宗教文化觀，對中西文化的互動和融合問題進行了比較冷靜、客觀和深刻的思考，在衆說紛紜的文化融合論中，不失為一家之言。我還特別指出：「韋卓民試圖移基督精神於中國文化之中，以達到改造中國傳統文化的目的，尚不能簡單納入『西方中心符』或『全盤西化』的文化模式中來檢討。韋氏的努力，似乎已超出簡單文化綜合的範圍，而是以一種宗教去改造一種特殊的文化，借助於基督教的普世性，而達成其創造世界大同文化的理想。」另一篇文章〈艱難的蛻變：解放前後的華中大學與韋卓民〉（收入章開沅、林蔚主編《中西文化與教會大學》，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則主要是利用保存較好的華中大學檔案，尤其是其中彌足珍貴的韋卓民個人資料，試圖對韋卓民與華中大學在時代轉折中的歷史足跡進行逼近的觀察，捕捉其內心深處的迷惘、思索與如何努力順應時代潮流，尋求新路的艱難跋涉。在這純屬個案的研究中，我也試圖將歷史探索的眼光放得更遠、更開，嘗試把握主宰個別人物與事件的更為長遠和深層的歷史脈搏的跳動。正如文章的結論所言：「某種意義上，教會大學從中國大陸的消失，乃是二十世紀以來共產主義革命運動與基督教普世運動正面衝突的結果，是中國民族主義與西方殖民主義反覆較量的結果，也是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政治格局重新調整和組合的結果。因此，教會教育的失敗主要的不是一種教育制度或宗教信仰的失敗，而是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在中國大陸政策失敗的附屬品。」

正是在這些更為深刻的歷史變動背後，隱藏著教會大學消亡的因果性。」

關於對華中大學的歷史研究也基本上是個案研究與宏觀研究的結合，希望通過對華中大學和其他教會大學的剖析，有助人們理解教會大學的宗教淵源、基本架構、體制運作、辦學特色、時代氛圍及其與社會所發生的方方面面的關係，當然也包括置身其間的教職員與學生，包括他們豐富多彩的校園生活本身。這方面陸續發表的論文有：〈教會大學的國際化特色：華中大學個案分析〉、〈抗戰期間教會大學的西遷：以湘雅醫學院和華中大學為例〉、〈艱難的歷程：華中大學的西遷〉、〈教會大學西遷述論〉等。史料是歷史研究的基礎，因此，我對國內外教會大學史料的收藏，尤其是華中大學檔案資料在海內外的分佈情況給予了相當的關注，先後發表下列文章：〈美國收藏的中國教會大學歷史文獻〉（與吳梓明合作，刊於《近代史研究》1993年6期）、〈華中大學檔案在國內外分佈情況〉（與方燕合作，收入吳梓明編《中國教會大學歷史文獻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5年出版）。另編有《韋卓民基督教文集》（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年出版）、《中國教會大學文獻目錄第三輯：華中師範大學檔案館館藏資料》（與方燕合作，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1997年出版）。

在教會大學史研究之外，我之涉足於早期中文聖經翻譯史和早期新教傳教士馬禮遜和馬希曼之爭，更純屬偶然。記得1997年春夏之交，我有機會到著名學府牛津大學從事為期半年的學術訪問。在長期忙碌的教學和行政工作之後，突然有一段個人可以隨意支配的研究時間，真是一種天大的幸福，成天忙

於在牛津各大小圖書館進進出出，悠哉游哉。一天，一位牛津的友人告訴我，隸屬於帕格瑞津學院的安格斯圖書館有一批中文線裝書，希望我能幫忙鑑定一下其價值。

如約來到該圖書館，初步的查閱令我大吃一驚，在這個貌不起眼的小型圖書館中，居然保存著英國浸禮會在華傳教的全部檔案和一批數量不大卻彌足珍貴的漢譯西書，而其中最具有價值者，當數馬希曼等人的早期中文《聖經》譯本。馬希曼英文名為 Joshua Marshman，1799 年被英浸禮會派往印度傳教，大半生都生活在印度。所奇怪者，馬希曼身為英國在印度的傳教士，一生中從未到過中國，卻鬼使神差對中文發生了濃厚興趣，與一位精通中文的亞美尼亞人拉沙一道，花費 18 年的工夫，於 1822 年將全部《聖經》譯成中文並在印度出版。這批浸禮會早期中文《聖經》譯本的獨特價值有二：其一，這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完整中文《聖經》版本，比馬禮遜和米憐 1823 年在麻六甲英華書院出版的全套中文《聖經》——《神天聖書》尚早出一年。據此可修正過去認為第一部中文《聖經》出自馬禮遜之手的通常說法。其二，在近代印刷技術史上，這部《聖經》中的《若翰所書之福音》，堪稱目前所知的第一本應用西方近代鉛字活版技術印刷的中文書籍。它於 1813 年在印度印出，比通常所知的 1822 年在澳門用鉛字活版印出的馬禮遜《華英字典》早了 9 年。

馬希曼不僅主持翻譯了第一部中文《聖經》，而且還於 1809 年將儒家經典《論語》中的大部分章節譯成英文介紹給西方。他還於 1814 年出版了用英文撰寫的《中國言法》一書，並將儒家的另一部重要典籍《大學》譯成中文，附錄於全

書之後。這本長達 600 多頁的巨著，係運用西方語法理論比較系統地研究漢語語法的英文著作之一，比馬禮遜的《中文語法》要早出一年。這充分說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是一個雙向對流的運動過程。一些傳教士在對中國宣傳西方文化的同時，又把中國文化介紹給西方，扮演了文化雙向對流中的載體角色。

在與馬希曼相關的文獻中，最令人感興趣的，還有一封馬希曼為澄清外界所傳他在翻譯《聖經》和著述《中國言法》一書時有抄襲馬禮遜之嫌所寫的長達數萬言的辯誣信，以及附於信後的與馬禮遜的往來函件。正是這批從未披露的檔案資料，使我下決心要弄清楚這兩樁發生於 100 多年前的公案：馬希曼在翻譯《聖經》時究竟是否抄襲過馬禮遜？馬希曼在著述《中國言法》一書時究竟是否抄襲過馬禮遜？其結果，便是收在本論文集內的有關二馬之爭的兩篇文章：〈馬希曼、拉沙與早期的聖經中譯〉（《歷史研究》2000 年 6 期）、〈語法書：馬希曼是否抄襲了馬禮遜？——十九世紀初早期英國傳教士之間的一場爭論〉（收入陶飛亞、梁元生主編《東亞基督教再詮釋》，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出版，2004 年）。我相信，這兩篇文章依據較翔實和可靠的資料，不僅初步解決了究竟是誰翻譯了第一部中文《聖經》的問題，而且，對圍繞聖經翻譯和中文語法書問題的二馬之爭也有了一個大致公允的解答。這些疑惑的解決，其真實的意義，還不在於還誰一個清白，而更在於釐清早期基督教在華文化傳播的一些線索，以重建正確的歷史事實，給歷史本身一個說法。這對於書寫完整、準確的基督教在華傳播史，是不可或缺的基本性

的工作，也是一項很有價值的學術研究，但願這樣認為不會是「王婆賣瓜」。

如前所述，就我對近代商會、商人和辛亥革命的主流研究而言，教會大學史和教會史的研究不僅起步晚，而且只能算是客串，談不上十分系統、深入的研究，雖如此，卻一點也沒有降低這一研究領域的巨大魅力和持久的學術價值。用我標題上的話來說，就是「曲徑通幽」，好似在森林裏散步，一不小心，順著一條彎彎曲曲的小徑，突然來到一片開闊地，這裏陽光明媚、鳥語花香、流水潺潺，是一塊全新的領地，充滿了尋幽索隱的新奇和樂趣，令人流連忘返。

涉足這一領域，一方面拓展了我的學術視野，接觸到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許多新課題，使我在學術研究上受到更多的鍛煉，得到相應的提高；但更重要的是於商會史的學術圈而外，進入了教會史的新的學術圈，結識了一大批心地善良、學養深厚、具有獻身精神的中外學人，多年來無論是在大陸、在臺灣、在香港、在美國、在英國、在日本，我都得到他們無私的指點與幫助，在與他們討論學術的過程中，學識與精神兩方面都得以滋潤和提升，感到極大的充實和愉悅，至今仍與其中的許多人保持深厚的友誼。相比較而言，我認為這才是步入教會大學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這一領域最大的收穫。我們固然是研究歷史、探尋過去，但某種意義上何嘗又不是享受當下、品味人生、創造未來。在終極意義上，我始終保持這樣的信念：歷史是一門人學、是一門美學、是一門藝術。真善美是不可分的，求真的同時，我們必須求善與求美，否則真亦不可得。教會史研究是否因其研究的特定對象、特定的研究命題，而更需

要真善美的內在和諧與統一呢？

我願沿著這條小徑繼續探索，期待在森林的更深處有更多的新奇和驚喜在等待我們。

馬敏